

## 出题者与考生玩起了侦探游戏

高考当天，不出意料，网上对作文题目一片波涛汹涌的吐槽声。山东卷的“肉豆”，安徽卷的“蝴蝶”，全国卷的“写信”，甚至“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女儿，都受到了口诛笔伐。著名编剧、教育学家、文化学者们一拥而上，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讨伐战中。

其实，每年高考成为靶子的不仅仅是作文题，顶着“让无数考生闻风丧胆”头号的数学帝葛军，也再一次被挖出来接受批斗。不过葛军大呼冤枉，“命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

确实如此。“高考命题，采取的是组长负责制。”广州新东方学校语文高级教研员、长期研究高考语文的莫彦聪说，“每个省的教育考试院会选拔大学教授、教研专家和中学资深老师参与命题，其中大学教授占大多数，考题是共同商议的结果。”

曾给2008年高考化学卷命题的某位教授透露，教师在考试前一个半月就被隔离，分科目出题，每组有命题组长，然后共同讨论出题，由命题组长统筹。首份试卷“出炉”后，命题组长将试卷交给检查组，检查组通过后上交省教育考试院，按照考试重点做最后定夺，然后命题组和检查组出另一份试卷，再上交省教育考试院。

而高考作文题有着基本的要求。莫彦聪透露，首先题目不能造成大众

的排斥。比如某年高考作文题为“时尚”，被指对于农村学子来说不公平。而今年山东卷的“肉豆”，因为同样原因，受到城市学生的讨伐。

“同时，作为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作文题目，既要让学生容易理解，还要让学生有发挥空间，这样才能‘分层’考查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内涵。”莫彦聪说，就像一份普通试卷，很难或很简单，都无法区分学生的水平，而没有正确答案的作文题，更是如此。“不能套作。”济南第十三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讲，如果学生可以把程式化的作文直接套用在作文题上，那么这个题目就是失败的。

所以，带有价值取向的作文题是出题者要避免的。比如2002年的高考作文题“心灵的选择”，设想自己在雪山遇到一个快要冻僵的人，是背他出去，还是自己一个人走出去。其实考生没有选择，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你要是自己跑了只怕要被大学扫地出门了。于是考生们只能选择去迎合主流价值观，而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这个意义上，出题者与考生之间，就像是侦探游戏。出题者在不断留下线索的同时，也不停地在掩盖线索，而考生就像是侦探，从字里行间发现出题者的真实目的。而作文题成为出题者最难完成的一种掩饰，既想蕴藏各种深意，又不想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作文题目被越来越多地诟病为“故弄玄虚”。

## 想要什么人才，我就考什么

不过，在科举历史上，考题承担的不仅是出题者的意志，也是社会的意愿。

当觉察到满朝文武都是一帮“官二代”的时候，隋炀帝深深地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担忧，于是就有了科举制度，让没有后台的草根们有了一次逆袭的机会。

唐朝逐渐建立起粗线条的科举考试制度，分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明算、明书、明法等科目。经学诗赋算数一箩筐，不管用着用不着，先把各方面人才网罗过来再说。那时候的科举制度还在摸索中，不知道什么方式选人得当，所以尽可能多设置科目，生怕漏掉任何一匹千里马。

随着政治体制成熟，皇帝们觉得儒学的教化作用应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所以，与经书有关的进士科和明经科就在大浪淘沙中保存了下来。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则重背诵。

但皇帝发现，善于琢磨主考官意图的考生们，出现了背诵现成范文的弊病，于是干脆在进士科中加了杂文两道，专门考查考生的诗赋水平。因为诗文是人情之表现，而人情又反映人性，所以以诗文作为考试内容，不仅能测试出考生的才华，还能反映出该考生的基本道德。

到了宋代，变法者王安石发现，通过华丽的辞藻把皇帝哄得团团转而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发展实在没有太大用处，于是他实行变法，以经义取士。这意味着考生们首先要把经书活学活用到国家治理上。不过王安石没想到，这个决定，让文艺青年一下子变成了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一直到了清朝，这个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深感科举的重要性，一上台就开科取士。但是又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了忧患意识，所以要限制士人们的思想自由，而考题就成为禁锢考生思想的有力武器。考生们在作答时，不能引用秦汉以后的事，不准说自己的思想，只准鹦鹉学舌重复古圣贤的观点，用古人的语气，大唱“天王圣明”的赞歌。于是老学究们变成了大唱红歌的热血青年。

而出题人也很难，因为题目被指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为了出其不意，考官会挖空心思，出所谓的“截答题”刁难。比如儒家经典《中庸》中有“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考官前面去掉“及其广”，后面去掉“木生之”，仅以中间本不相连的“大草”二字为题，让考生实在摸不着头脑。

到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代表封建统治者意志的科举也遭到抨击。于是科举迎合环境，出了类似“师夷长技的重要性”，以及“法国拿破仑与我国项羽的比较”等试题，以此来促进与近现代教育的接轨。

不过奇葩的考题造就了奇葩的答案。有一位考生开篇直接破题：“夫项羽力能拔山，岂一破轮而不能拿夫？”全文论证了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思想感情。



古代科举考试场景。（资料片）

# 出题者的脑袋装的是什么？

“肉豆”是什么？还有那位出题“家长开车打电话，女儿举报”的老师，在网上已经被无数考生问候过了：你开车打电话，让我们几十万考生给你写信！开玩笑！

但玩笑归玩笑，在“肉豆”、“写信”背后，你真的理解出题者的意图吗？你真的明白其背后蕴含的改革深意吗？其实，每个考题，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只不过这几年想着从应试教育转型，考题也变得奇葩和沉重了。

本报记者 陈玮

## 思想没有正确的答案

以考试来迎合国家需要，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分析今年高考作文题时发现，作文题更强调思辨和表达，不再那么与时政紧密结合，这是在朝作文本质回归。语文作文不是时政题，也不是科技题、历史题，应该注重学生的思想和表达。不少省份明确提出不得“套作”，材料作文是由学生自行命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学生写出自己内心所想。

莫彦聪说，目前的试题正在渐渐脱离应试的樊笼，“比如很多主观题，以前是按要点给分，这意味着你只要写出要点即可，其他就算胡说八道也会给分。而最近几年，主观题有了逻辑分数，这使得在教学中注重逻辑性，而不是单纯罗列知识点。”

“这与目前国家的需要有关。”莫彦聪说，如今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单纯依靠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很难适应经济腾飞的现状。“教育要有十年的前瞻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增加附加值，强调原创性，所以现在格外重视考生的综合能力，因为这才是国家未来需要的人才。”

而应试教育只适应工业文明初期，有基础知识即可找到好工作。但现在，国家需要的是精英人才。莫彦聪说，“所以要用命题倒逼教育改革。”

但相对自由的命题，依然被考生吐槽：绕来绕去的材料看不明白，不知道出题者想要什么答案。多年来习惯了回答对还是错的考生，似乎不知道，很多时候并没有正确答案，只需要自己的思想。

脱离应试教育的试题，给予考生同时也给予出题者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中，出现了不少败笔：比如带有常识性错误的安徽卷“蝴蝶翅膀有颜色”，用童话故事命题的湖南卷等。

莫彦聪说，比如全国卷作文命题“写信”，可能会伤害很多注重人文素养教育的高中老师，因为这样的考题不需要大量的阅读量、语文能力以及人文素养。

“不管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综合能力的考验，都是挑战，也是阵痛。”他说。

# 出题是个危险事，出不好要人命的

本报记者 陈玮

表面上，高考出题人主宰着几十万考生的命运，看似风光无限，其实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

“像蹲监狱。”一位曾经参与高考命题的大学教授说，命题老师要封闭一个多月，其间一切活动都被隔离，没有自由。甚至走路都要在中间走，一靠近身边的花坛，就会被警告，以防有人趁机往草丛里扔考题。而且还不能乱说话。一位老师说了句玩笑话：“监控要是坏了，不就方便偷题了？”结果被执勤武警听到了，这位老师连同该命题组长立马被叫去审查，最后还写了检讨。不过没有自由的代价是伙食和住宿条件还是令人满意的。

不过这事要是放在古代，稍有不慎，就不只是写检查那么简单了。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借命题向

皇帝或权臣高唱赞歌，是常见的事儿；对权贵暗讽，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指摘试题，上纲上线，并借此攻击考官，就不是一般人能掌控的了，而掌握此技能的翘楚，是明朝奸相严嵩。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丁酉科乡试，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挑剔应天乡试的“策问”题含有“讥仙”之意，于是皇帝将主考江汝璧和欧阳衢下狱，审查结果虽只是给了降调处分，但从此开了借用试题打击考官的先例，同时让严嵩等更多人看到了一条铲除异己的好方法，不少重臣纷纷因此倒台。

不过最倒霉的，莫过于山东考官叶经。严嵩奏报山东试录中第五道时务策有“讥仙”之意。明世宗名义上发给礼部参看，但礼部尚书张璧早已领会皇帝的心意，于是鸡蛋里也挑出了骨头，治了提调官的罪。而明世宗想到两年前，山东首篇文章的主考官叶经曾经弹劾他最信任的阁臣严嵩，对他

这种打狗不看主人的行径早已怨恨，于是又在鸡蛋里挑了第二块骨头，命廷杖叶经八十，叶经当场被杖毙。

此后，考官们出题时提心吊胆，唯恐碰上了忌讳，只能围着歌功颂德大绕圈子，于是全国试题皆是阿谀之作。不过这种歌颂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会试，正主考高拱出的首场题目出自《论语·子张篇》，因为题目下文是“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怕死的皇帝认为高拱有意诅咒，大为恼怒，幸得首辅徐阶打了圆场才化解。而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一时风光无限，习惯谄媚的主考官们自然也不放过利用考题为张居正歌功颂德的机会。不过张居正一死，这些主考官们就倒了霉，御史丁此吕因为曾在题目中把张居正比作“大禹”，落得个逐出谏台的下场。